

记者手记：

5月15日，邵楠正式从骑手的岗位上“下岗”，那一天开始，街道上的外卖人员越来越多，药店配送压力减少。之前，邵楠提交了《关于改善快递小哥管理工作的建议》的提案，得到了上海市商务委高度重视，针对积极解决快递小哥住宿等困难，提出了一系列措施。比如推进“小哥驿站”建设，做好住宿资源协调对接，以及启动配送寄递人员“电子通行证”。

6月1日上海宣布恢复常态化管理，两个月封控，邵楠即将走出“物理”的门，接下来还要走出那道“心中的门”，走在人潮汹涌的都市，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。

能缺。但苦于整个上海运力紧缺，有的人买不到药，而有的人买到了药，也一直配送不到位。

我见过药房里，最夸张的一幕，在五六百平方米的药房里，一个药剂师一个人连续工作15天。药房的订单一排一排地堆积如山，有一次，我从进店到离开，15分钟过去了，那些客单价只有十几块钱的药品订单，一直没人取。

而有些药房今天开，明天关，零售窗口又没有全开，需求全部挤在了线上。即便现在有人手来支援，也是杯水车薪。但要说，我做骑手，能解决什么运力问题，不现实。我个人力量很有限，目前的配送范围基本在虹桥镇附近5公里内，电动车一次最远只能跑20公里。

我算了下，从3月31日到4月17日，我接单18天，总共只接了42单。而这些订单都是在下午和晚上完成送达的。

邵楠一开始注册成为骑手的原因，是为了送药。



冒最大风险 仍不被理解

在上海这座城市，大多数骑手仍然保持着内心的善良与同理心。虽说骑手不太愿意做单价低的单子，但能接的也都会顺路接掉，药店里的单子更不是我一个人送的。

作为政协委员，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骑手，家里不缺菜，也不缺少关心和投喂。只是干了一点小事，不是什么“城市英雄”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。我更关心的是，封控期间，有人关心过骑手的生存现状吗？有人理解骑手的处境，给予他们回馈与温暖，但更多时候，他们可能并不被大家理解。

有一次，一个治疗咳嗽的川贝枇杷膏的订单送到长宁，订单上的地址在一个很小的菜场，那里挂了个牌子。顾客打电话说，就在铁门后面，只见他从卷帘门里探出头，示意我用脚把箱子踢过来，别靠近，接着卷帘门慢慢升起。而类似的风险事件，我遇到过两次。难以想象，铁门背后的人正在经历怎样的煎熬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其实这个城市里，有很多人比你更难，而我还发现了更多的边缘群体。

就像快递小哥这个群体，他们不应该疫情期间成为热点，又在疫情过后，被忘记。做骑手这半个月，我写了一些社情民意提交了上去。面对这些拿命补给的骑手们，如何想办法让合格的运力回到工作岗位中，能否及时提供疫情地图提高运送效率，又是否能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保障的酒店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前几日傍晚，做骑手的间歇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：街上的人和车好像比前几天多了一点点。坐在小区门外椅子上歪头睡着的大白，穿梭来回的外卖小哥。坚守岗位的警察叔叔，搬运补充抗疫物资的街道工作人员，还有送药的我。这世界会好吗？你看见远处那道穿破乌云的霞光了吗？